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乾隆三十七(1772)年正月,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旨全国征集书籍,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凤号荒微,人文卑陋,无书可献。200多年前的贵州,因为文化匮乏的无奈,对《四库全书》征集的贡献实感力不从心,谁能想到100多年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避抗战烽火,西迁至贵阳秘藏6年8个月。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钟海珍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尘封历史。

《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7部,分藏于南三阁(文溯、文汇、文宗)和北四阁(文溯、文津、文源、文渊)。北四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而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江浙两省的地方官员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选择专人掌管书籍,并允许当地士子进阁阅读抄写。其中,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作了一个大胆果敢的决定,把《四库全书》悄悄运出杭州。

1937年8月1日,浙江图书馆全馆职员集中孤山分馆,点书装箱直至3日深夜,《四库全书》140箱、馆中其他古籍善本88箱,共计228箱,8月4日,这228个大箱子离开孤山馆,运往浙江富阳,这处于杭州沦陷之前离开了杭州。

从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历时整整9个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000多公里。在战乱和交通落后的条件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体外,大多数路程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

《四库全书》运抵贵阳是在一个深夜,存放在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据档案记载,这一批书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舍是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使用,条件很差,不但面积狭小,而且房屋结构不适合作为图书馆,没有人知道《四库全书》要在这里存放多久,就像没有人知道抗战要持续多久,于是,建一个专门书库的计划就被提上日程。1938年5月27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完成了《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设计说明书》等,呈报上级,详细说明了书库的构造设计。

然而,战乱时期,条件所限,时间紧迫,这个书库只停留在了图纸上,政府最终决定购买现成房屋来解决存放问题,于是,教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资购买张家祠堂。张家祠堂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藏书要求,稍加修缮即可使用。的确是一个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据1938年8月16日出具的收据显示,购买张家祠堂房屋地皮,共花了法币贰仟肆佰元正。

1938年9月28日,140箱《四库全书》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5年8个月(1939年4月8日-1944年12月6日)。

和《古今图书集成》,以及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入藏张家祠堂。一起进去的,还有被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他们住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

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18架飞机成品字形,从城东侵入市区,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而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约2公里,古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四库全书》转移到贵阳城郊十里外的许官渡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地处北郊,有茂盛的森林,坚固的溶洞,安全可靠。经贵州省教育厅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迁往地母洞,因地母洞面积有限,贵州省立图书馆的古籍仍存放张家祠堂。

贵阳多雨,天无三日晴,实在不算是藏书的好气候。于是,在把《四库全书》迁到地母洞之前,为了防潮,人们在洞内筑起了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上放置石灰,在台上靠近洞顶的地方,建了一座斜形瓦棚,用来遮滴水。《四库全书》放入地母洞后,为了方便看守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

尽管对地母洞作了多重改造,人们还是担心《四库全书》潮湿受损,一度商议运往抗战时期迁至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托管。为此,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特命

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开了几箱书后,没有发现潮湿霉烂,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籍,地母洞又有防空优势,在贵州省很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准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就这样,《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中安然无恙地保存了5年8个月之久。当然,这安然无恙背后,是人们对古籍的多方呵护。比如,为有效防潮,当时专门制订了晾晒《四库全书》的具体操作流程,在第一次晾晒时还顺便做了《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因为首次晾晒的除湿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四库全书》进行晾晒除湿就成为定例,1942年后,又在春季增加晾晒一次,为每年两次。

但是,《四库全书》还是不得不离开地母洞。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县,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四库全书》转移重庆。

1944年12月,教育部委托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到贵阳接运《四库全书》。12月6日,毛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书从地母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日,《四库全书》装箱起运,12月23日,安抵重庆青木关,存放在教育部官邸旁边的楼房中。此后,陈训慈等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负责保护工作。

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的《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

耗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抵达杭州。自1937年离开,9年后,《四库全书》终于回到了它来时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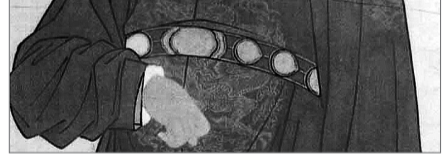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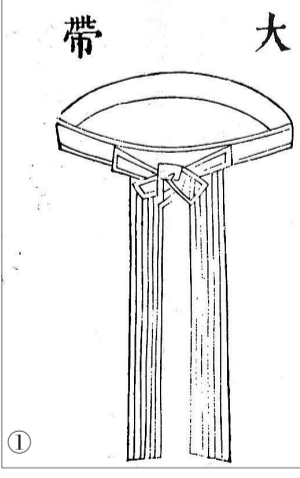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了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5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7个月之后的5年8个月都是在洞度过的。只是旧迹难寻,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深藏于森林中。但地母洞存放《四库全书》的这件大事,在当时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直到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有记者到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拍摄专题片,几经周折才找到地母洞。

今天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静静地存放着273页《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它真实地保存和记载了抗战时期,《四库全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表格及各种凭证等。

2018年,钟海珍等人到地母洞调研时,偶遇当年地母洞藏书的见证者,专程从重庆到地母洞探访的姜相荣老人。老人当年还是八九岁的孩子,就住在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下,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老人回忆讲述了当年与他爷爷和父亲到地母洞搬书、晒书的情形。当拿出194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书的照片复印件请老人辨认照片上的人时,遗憾的是,老人患有眼底黄斑,终是无法看清。

钟海珍说,现在地母洞旁的浴火文澜战时书库陈列馆正在建设中,不久的将来,将通过馆藏实物、史料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全面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珍贵典籍的壮举。

一条衣带中的道德、等级、文化



唐带皇帝的跨带

者,示谨敬自约整。意思是,人之所以系绅带,主要是为了表示做人谨慎、对人恭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所以绅带不仅仅是一条衣带,同时也是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标识,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就是传说中的绅士。

历史上堪称绅士的人有很多,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位。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就义。他的夫人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发现了一篇写在腰带上的文章《自赞》。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这篇《自赞》显然有一种自我总结与自我确认的意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死亡的恐惧,一个人所想的还是如何仁至义尽,问心无愧,这个人的品格远非常人所能及。坚守忠义,保持节操,无疑是示谨敬自约整的绅士风度。

文天祥就义的时候,到底系的是什么衣带,史料上并没作明确交代。但是在监狱里关押了3年,不可能穿官服或者军装,他穿的很可能是囚衣或者便装,与之配套的应该是一条普通的布带。虽然不是官员的绅带,但是文天祥的身上绅士品格却一点也不没有因此而缩减。

北方的游牧民族早期系皮带是顺理成章的,而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汉族,因为也曾经常狩猎生活,所以早期也使用皮带。那个时候的皮带分为两种,一种是韦带,一种是革带。韦和革都是去了毛的兽皮,不同之处在于韦是熟皮,革是生皮,后来两者都统称

为革带或鞮带。革带的发展,游牧民族显然更占优势。从战国中期到南北朝,革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在众多革带当中,以蹀躞带(图2)最具代表性。蹀躞带的样子很像现代的电工皮带,上面有多个挂环,以携带小型武器或生活细软,适应游牧民族移动性强的特点。在一些古代画作当中可以看到腰缠蹀躞带的人物,甚至连女性也有类似的装束。

中国服装的发展,等级分明是一条主线。从南北朝开始,蹀躞带上的挂环也逐步演变成等级标志,天子按规定为13个环。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中出土了一条完整的帝王十三环蹀躞带,上面的挂环是金镶玉的。

蹀躞带上面挂了很多零碎东西,走路来难免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显得不够庄重,所以后来逐渐用铜取代了挂环,变成了跨带(图3)。跨带就是皮带上镶嵌的玉石或者金银铜饰。虽然目前无法确知这一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唐朝开始有了正式规定。

《唐会要·章服品第》载: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铤。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铤。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铤。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铤。可见在体现等级制的同时,革带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

到了宋代,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找到了一位出色的工匠,让他在紫云楼下制作金带。皇帝经常过来监工,大师不敢怠慢,只做了30条就累死了。这30条绝版的金带,就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紫云楼带,堪称北宋朝廷的镇库之宝。可惜后来战乱频发,这些宝贝在宋徽宗的手上散失了。

又过了很多年,海外来人,拿出一条紫云楼带让岳飞的孙子岳珂看了其中四铤。按照岳珂的描述:首先,这四铤要比当时的规格做得更大;第二,使用的紫金,光彩夺目,非同寻常;第三,人物是突出来的,虽然不到一寸,但眉目生动,即使是名画家吴道子,也画不出这种神韵;第四,花纹是镂刻的,有六七个层次,刀法之细腻,连鬼神都无法想象。岳珂在《愧

郊录》中说:是在往时为穷极巨宝,不觉为之再拜太息。

不管岳珂描述得多好,都很难回避现代人对历史的质疑。唐宋皇帝把武装军队的革带变成了奢侈品,未免荒唐。也正是由于这种思维的影响,之后革带上面的金玉也越镶越多,致使不断增加,最后变成了一个比腰还很多的大圆圈悬挂在身上,成为彻底的炫富工具。而当举国官员争相炫富的时候,民众所受的盘剥将何其严重,这个朝廷将会走向何方?

衣带,是生活的必需品,同样也给语言和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内涵。比如,说两个地方非常近,叫“一衣带水”。这个成语出自隋文帝杨坚之口,他在北方建立隋朝之后想要统一长江以南地区,于是他问:南方的百姓都把我当成了父母,我岂能因为一衣带水,就是像衣带那么窄的水流阻挡,就不去拯救他们呢?

再比如,通过女人的姻亲关系所缔结的利益同盟,叫裙带关系,说到时间久远,任何动荡也不忘初心,叫带砺山河,这里的山是泰山,河是黄河,视泰山为矮矮的磨刀石,视黄河为窄窄的衣带,这种胸怀和气概,还有什么动荡战胜不了。

同时,由于衣带与身体的关系密切,也会在很大程度影响民族心理和性格。虽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能从中找到相似性,引发思考。

虽然布带和革带都是用来约束服装的,但它们之间的特点也很分明。布带的约束柔软体贴,富有弹性,革带的约束则严格规范,可丁可卯。所以,文人喜欢系布带,而军人则必须系革带。

再打一个更大的比方,布带对人的约束更像是道德伦理,而革带就仿佛是法律法规;强调道德伦理是儒家的特点,强调法律法规是法家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推崇儒家,这一点与中国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喜欢腰系布带而非革带,在心理上似乎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袋》系列讲座主讲人)

编者按
捐块置澧浦,解佩寄中洲。细数来,玉不知蕴含着中国文化里多少意义和情感:尊贵、不朽、仁德、真诚、爱慕、乃至决断。几千年来给予着人们难以言说的力量。而从射礼的玉块渐变到腰间的佩玉,也显示出周代到汉代玉文化的变迁。抛却了礼制的肃穆,平添了世俗的感性。孔子曾论玉与君子德行的相似之处,最后一句是“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相信如道一般在中国文化中绵延不断的玉,也将一直存续下去。

□ 左骏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三者。(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6年,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际,先入关中的刘邦屯兵于灞水河畔,项羽驻扎于戏水以西、渭河南岸的鸿门。而后刘邦亲赴鸿门拜谒,项羽则在军营设宴留饮沛公。宴上项羽父兼谋士范增数次以眼色暗示项羽当机立断擒杀刘邦以绝后患,见项羽默不作声,一连三次举起所佩玉玦。

鸿门宴上范增所持玉玦,是跌宕剧情中的重要道具,很显然时人皆知这一暗示,举玦蕴含着决断与决绝之意。对今人而言,玉玦的样貌主要来自清末学者吴大澂的考据。自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在东北以及华东史前墓葬中同样频频发现这类玉器:带有一个缺口的环状玉质饰品,似乎正合文献中“玦如环而缺”“半环玦”的描述。但这真是范增手中的玦吗?

2001年山东青岛土山屯编号为M6的西汉墓,男性主人棺内清理出土镂空螭虎纹玉玦一件。玉器发现时尚位于人体左侧腰部,按此推测是男士的佩玉。同时在棺内发现一片木质遣册,详细记录了棺内的随葬品名与数量。木牍背面第五行首书“玉玦一、下书“寿(壽)半簪一,按“寿半簪”为玦瑁发饰;“玦”可通“玦”,故玉玦便是玉玦,无疑应亦是饰品。查同出玉器共计7件,除见玉带钩、玉印各一件,另有口琖、塞具共5件,故而玉玦当是镂空螭虎的玉器属物。

这件两千年曾经被摩挲把玩的螭形佩,得益于随葬遣册上一丝不苟的记录,让实物与文字两者相印证,确凿地为“螭形佩”来正名,这便是汉代文献中频见的“玦”。

南通博物苑玉见你展览中,也正在展出一件新莽时期螭形玉佩。它因长久地埋藏而受沁呈黄白色,不过透光处还能窥见原本的青色玉质。居中的是一个椭圆形带螭造型环状物,在其周围缘绕螭雕螭螭,璆下饰以翻转的云气。这件螭形佩与土山屯六号墓玉玦相比,不仅器型基本相同,时代也均处于两汉之交,并且同样出土于男性墓主腹侧,本也是佩挂,无疑便是一件玉玦了。

那么玦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范增举玉玦可以暗示项羽决断呢?西周恭王十五年五月壬午日,陕西周原的新官射场举行了次日隆重射箭比赛,周王莅临并赐予臣子赵曹诸兵器,赵曹铭感周王德赠铸鼎纪念(《十五年赵曹鼎》)。鼎铭中一字与所赏赐弓、矢并列,形如人之右手拇指戴环状物形象,而被古文字学者隶定为“夬”,即为“玦”。这也是目前最早有关射弓“夬”的文字材料。

夬,因玉质而为玦,然而玦是如何从护指变成了形态和使用功能都几乎完全不同的螭形佩呢?

作为夬的玉护指源于商周时期射礼制化后的产物,以玉质的弓射护具,当然是为了彰显使用者的高贵。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是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筒型玉护指,其上依然保留着较原始的扣弦刻槽。

两周时期的玉玦发现数量激增,常见出土在使用者的左右两手处,型制已成为便于拇指舒适按压的矮体扁形。这样的造型比商代的筒型护指,更利于拇指回勾勾住弓弦引开强弓,正如《周易·归》中所言:“夬,决也,刚决柔也。”

两周之交时,玉玦一侧开始出现钩形的璆,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细节则是对舌型玉玦功用的重要改进。按射手通常左手持弓,右手戴玉玦,右拇指内曲,以玦内侧面扣住弓弦;此时侧璆正好可以压住箭括(尾)位置,稳定箭杆避免从弦上滑落。如此以椭圆形舌型的主体、加身侧伸出璆构成的玦型,所谓“螭形佩”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此时方才具备。

可以想象,正如射手引弓撒放,箭被快速射出,刹那不容容断,当机立断方才行之有效。春秋争霸之际,玦已被认同具有决断或断绝的意义,即“儒者授佩玦者,事至而断”(《庄子·田子方》)。

至战国中期后,伴随着世俗化的燕射、军射、弋射盛行,实用型玉玦开始式微,由此转向佩饰化的玉玦。《诗》中即有:“芄兰之叶,童子佩鞶。”(《国风·卫风·芄兰》)描绘了鞶佩垂于少男腰间的形象。其中,鞶是衬于袂内的皮垫。约在战国中期之后,皮质的鞶渐而指代实用型护指,玦则成为玦类佩饰的专有名词。

诗人屈原将佩玦抛入江中,以抒发心中的愤慨(《楚辞·九歌·湘

君);而鸿门宴上频繁佩玦的亚父范增,亦是土生土长的楚人。也许秀颈小腰佩玉玦,便是那时楚男士最追捧的时尚潮流。在艺术上承接楚风的西汉,男女腰中佩玦更为风靡。西汉早期徐州北湖山楚王墓发现的玉玦,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展览中这件新莽时期的玉玦,在繁复的纹样中依旧可以辨认出侧璆,也不禁让人联想起新莽地皇四年(公元前23年)曾发生与鸿门宴剧情如出一辙的大事件:起义军所拥戴的更始帝大会诸将,计划诛杀功高盖主的刘演,先以观摩为名取下刘演佩剑。正当此时,御史申屠建献上玉玦,以佩玦催促更始帝早做擒杀刘演的决断(《后汉书·齐武王传》)。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能决嫌疑则佩玦。两汉之际,佩玦依然承担着行事果断、决断的寓意。”

此外,赐玦、赠玦、献玦,又是表示善意的行为交往。钟繇以旧鞶、东汉尚方宝玦相赠曹丕,为此兴致颇高的曹丕还歌以《玉玦赋》;孟达曾赠玉玦与诸葛亮;审配书于袁谭、吕布信中,皆提及赠环、玦,足见汉末三国之际士人的喜爱。

两汉时期,玉玦也被穿系彩绶、缀流苏成璆,张挂于帷幔羽葆之下,为华丽厅堂的点睛之笔。每当风起,璆璆随风摇曳,或再坠以铃铛与绶带,悬黎垂棘,夜光在焉(《西都赋》),风动铃响可增盎然仙气。

然而,伴随着魏晋时期接踵而至的动荡,士人腰间的块佩逐渐退隐于历史潮流中,后世遂难以探究其形制。直至千年后的好古敬求者,拨开历史尘埃,追本溯源,才终于又演绎出范增手中神秘多彩的玦。

(作者系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龙凤纹玉鞶形佩
文物时代:新莽时期(公元9-23年)
出土地点: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裴窝后山一号墓
保存地点:徐州博物馆